发现·运河

日前，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通航、省书博会在沧召开，大运河畔热闹非凡，作为沧州文脉之一的大运河文化如一船明月，临波而现，且将踏浪远去，向八方游客展示沧州的文化魅力——

# “墙内开花”更待“墙外飘香”

本报记者 刘 伟 摄影 王少华

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通航。河水清清，绿树荫荫，两岸风光如画。

## 大运河文化“花团锦簇”

“9月1日，运河城区段实现了通航，以后大家参观浏览大运河，除了能看到大运河美景，更能感受到大运河文化的魅力。”内蒙古武警边防总队原总队长、作家李炳天将军一直关注着家乡运河的点滴变化，他感慨地说：“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之河，大运河文化是沧州的文脉之一，武术也好，杂技也好，音乐也好，都与大运河文脉命运相连、息息相关。”

作为京杭大运河流经最长的地级市，这条水脉承载了沧州的多个文脉。沧州从不缺乏文化，无论是杂技文化，或是武术文化，或是诗经文化，都离不开地理载体。大运河，尤其是在通水、通航之后的大运河，以及建设在大运河两岸的文化建筑，完全可以成为承载这些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载体。

“大运河是城市的骄傲，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形象、生态形象，带给人们更多的幸福感。”看到运河城区段通航，一直在大运河畔组织推广文化创意产品的清风市集发起人张立民同样激动。

随着大运河畔文化氛围的日渐浓厚，依托大运河以及沿岸的各个文化地标，运河文化故事越来越丰富多彩。

“大运河是中华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下的物化载体，是典型的‘丝带状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岁月演变中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尤其沿岸密集分布的村庄城镇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运河人文景观，承载和积淀了深厚的民俗民风。沧州段亦是如此。文化氛围、自然风情、历史状貌等各有底蕴，特色鲜明，富有魅力。连镇谢家坝、泊头鸭梨、沧州三楼一院(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和沧曲书舍)以及沿岸密集分布的码头渡口等遗产景观、风物特产，皆系人河关联的文明印记。”一直致力于大运河文化研究的文化学者王立成，谈及大运河上的文化地标更是如数家珍。

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不仅见证了沧州古城千年以来的绰约风姿，也承载了地域文化的旖旎风情。如今，随着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掀起高潮，大运河文化正走出沧州，把这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呈现在来访游客的面前，吸引更多区域内外的关注目光。

## 文化流量引来八方游客

8月26日至28日，第十二届河北省图书博览会在大运河畔百狮园举办，吸引来12万人次观展。在畅享这场文化盛宴的同时，“大运河”也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热词”。

“书博会上，我有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参加，他们说，应该多举办一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沧州文化特点表现出来。一座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不仅能把人引来，还能把人留住，这就是城市文化的魅力。”从事文创工作多年，张立民认为，可以用文化流量带来客流。

他举例说：“云南丽江主打民族文化，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文字、音乐等一系列的文化元素进行推广。比如，把少数民族的文字显示在路牌上，在晚上举办少数民族的歌舞，推销一些特色民族乐器，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上当地文化。其实我们也可尝试把大运河文化具体化，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事实上，目前在沧州，有关大运河文化的讲座络绎不绝，朗吟楼、南川楼等一系列文化古建的宣传也如火如荼。

对于如何破解这些文化流量的“密码”，王立成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加强运河沧州段科学有序地保护和开发方面的高效宣传，是沧州这座河海相济的城市紧跟时代潮流、提高历史站位、弘扬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传承沧州历史文脉、庚续英雄的沧州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血脉，增强全市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凝聚力，推动沧州向着全方位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进发。基于此，建议发动社会各界有生力量，集中联合新闻报道、图窗展览、旅游文化服务、项目策划及新媒体开发等资源，采用文字、视频、图片、实地游学等方式，小切口大主题，形成沧州运河段保护性开发宣传的新高地，进而讲好沧州运河故事，成功向世人塑造一个古老与现代相结合、自然和人文相共生、含蓄内敛和活力无限相交织的沧州发展形象。”

## 集思广益共谋文化“出圈”

众所周知，沧州已经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经济布局规划中，如能在文化建设上参与进来，等于拥有经济、文化两张进入更高平台竞争的门票；其次，相比省内兄弟地市，216公里的大运河是沧州所独有的地理文化资源，打造好大运河这张文化名片，有利于塑造独特的城市形象，从而提升整个城市文化的软实力。因此，要用好汇聚于运河两岸的文化优势，除了在域内讲好运河故事之外，更应走出去。

“关于大运河的对外宣传，我认为有一个方面可以重视起来，就是关注自媒体这个方面。现在自媒体的宣传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优势能够从多方面、多角度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他们有各自的方向，有各自的粉丝传播群体，而且这些传播群体，有一致性，也有独特性。通过全媒体的共同参与，可以扩大对大运河文化的宣传。”沧州师范学院教授孙云英认为，大运河文化的推广与宣传可以借助多种形式，目的就是“引流”。

对此，李炳天建议：“文化还要和旅游结合起来，比如沙家浜的春来茶馆，一个小茶馆就是一个景点；再比如广西的刘三姐印象，一场戏就是一个景点。我认为，宣传大运河文化，应从旅游角度来看，可以整合运河文化，第一天看什么，第二天看什么，等等，天天都有新内容，这样文化旅游才能真正活起来。”

“其他运河途经的兄弟城市诸如扬州、苏州、杭州等皆有经济富庶、运河航运经久不息、人文根底纯厚等先天优势。扬州的瓜洲古渡广闻天下，2020年11月著名歌星刀郎推出了新歌《瓜洲渡》。制作精良的动漫MV中，刀郎沧桑饱满的嗓音，配上瓜洲唯美的水文气象和凄凉哀婉的人间爱情故事，迅速火遍网络，瓜洲也在脍炙人口的传唱中风头无双，极力强化了本来就已家喻户晓的名声。沧州也可立足本地特色，将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打造属于沧州自己的运河城市之歌。朗朗上口、唱红全国的歌曲在对外宣传的效能上立竿见影，对于提高一城一地的知名度大有裨益。”与李炳天看法相似，王立成也建议从文化“小元素”入手，四两拨千斤。

为此，有学者提出推广大运河文化可采用的四种方式：一、运用纸媒，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字，借助域内媒体与省级乃至国家级媒体，进行传播；二、通过视频，尤其是精彩短视频，利用新媒体平台推送；三、创办文化论坛，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吸引全国文化专家的关注；四、大运河是文化的“富矿”，是文化创意的源泉，开发沧州大运河文化以及沧州其他文化的IP，可进一步宣传沧州以及沧州文化。项目搭好台，文化能唱戏；文化唱好戏，同样能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宣传必然会带来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有助于沧州文化的深度挖掘和传播，同时，沿运河两岸的生态文化资源也有了用武之地，毕竟有文化依托的旅游资源才能引客和留客。

让我们共同期待着通过大运河文化的“墙内开花”，带来文化传播宣传的“墙外飘香”。如此，沧州硬实力和软实力必将得到同步提升。

# 风物长宜放眼量

祁凌霄

9月4日下午，黄骅青年文化研究者谷园在沧曲书舍发布了新书《东汉兴衰史》。发布会现场展示的作者十余种解读经史类著作，是他自2011年以来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引发观者很多思考。

无疑，谷园的成果丰富了沧州文化研究。这种丰富是文化种类的增加，而非同类的叠加。近20年来，区域文化研究在全国风生水起，几乎各地都有一批研究者着眼于当地文化研究，热火朝天，成就斐然。然而，当我们冷眼看待他乡地方文化时，似有一种感触——很难引起外地人的兴趣或深度共鸣，即使感到新鲜好奇，也是瞬间即过，过去不留，内心留不下太深的痕迹。比如，当长江边的土著滔滔不绝向北方游客介绍当地文化时，游客对这些文化的情感，应远不及家乡村口的一条小河，心向往之的，当是历史积淀下来的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樯橹灰飞烟灭”等带有普遍共性的成面成块的文化介质，而不是那些琐碎。反之，外地人看沧州，或许也会有此类感触。文化大书里夹杂的碎片，很容易飘零。

生活中人们常有此体验，当人喋喋不休诉说自家孩子多么可爱调皮、祖宗如何丰功伟绩时，听者并不感兴趣。所有夸奖或赞美，只是迎和的一场短剧、礼貌性一笑而已的轻浅。

因为情感，孩子要夸，地方文化要做，特色要突出，但如何规避那些一笑而已的尴尬？

冷眼向洋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

热情是研究的动力，但不是能做好的必然；地方文化有区域吸引力，却未必都能产生普遍性共鸣。

从历史上看，即使从3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来观察，当“乾嘉学派”为考证一个字而耗费20年心力并著书立说时，被视为蛮夷的西方已经产生了超越中华的文化巨变。文化史上的“乾嘉学派”贡献很大，但放到近代世界进步史里，笼罩中国300余年的乾嘉学风，使当时社会阶层产生一种普遍的“中华老大”的自得，对自己的“长袍马褂”“钟王小楷”过度迷恋，未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思想裂变，不能提供民族继续行进所必须的思想支撑，直到100多年前，被迫向西方寻找，向世界放眼；当明初“寸板不得下海”，康熙海禁直到乾隆纠结于觐见礼仪、地大物博而拒绝通商时，西方已慢慢产生了海上霸主；当清代人自豪于影响全世界的唐《永徽律》时，西方已诞生了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近代意义上的民商法也陆续完成，文化领域不能提供民族行进所必须的思想支撑，迫使1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得不放弃数千年屹立于世界的中华法系，而转向移植德国法和日本法，中华法系不复存在。

当前，人们对沧州文化研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度，从方言到遗存，从风土到人情，边边角角，都有人在做。如果热度再加以冷眼，放眼看世界、看全国、看历史、看当下、看自己、看共性与特性的结合部，在纵横捭阖中定准理性坐标，则前途不可限量。

沧州文化有很多脉络。然而历史文化的主干无非是两条大河在东部大海汹涌的开阔、西部山川阻隔的平坦之间时空交叉所积淀的痕迹。放到这一交叉中去看沧州当前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还有很多遗憾：海洋文化、北方平原文化，尤其是黄河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或是不成体系的碎片。而对于大运河，若能通过研究，疏通两大水系对于沧州文化承前启后的塑造作用，探寻与全国文化之间的共性、在中华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则能整体看待，穷根溯源，反思得失，为沧州文化的未来，贡献历史性张力。

沧州文化绝不仅限于沧州区域里的文化，但又离不开沧州元素。沧州这片热土应贡献更有深广度的思考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前人论之，如冯道官刻九经、纪晓岚修撰《四库全书》、张之洞践行“中体西用”等，之所以使沧州产生历史和世界性影响，是因为他们都以热情和冷眼，把握了民族文化共性，在时间演进和空间交叉部，具有横与纵的观察力、践行力。

在谷园新书发布会后，作者用毛笔蘸金粉签名赠书；他的新书及以往的经史类著作，观其大略，以史说经。这都具有传统文化意味。多年来他利用视频等说经讲史，其形式则带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岁月飘忽，形式不居，形式是利用的工具，而内容却永远为王。当谷园的《东汉兴衰史》在大运河畔发布的那一刻，沧州区域内黄河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交叉研究，似有了另一层意义。

人文论谈

# 文化界热议 “一船明月过沧州”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8月31日，本报刊发《“一船明月”驶向谁边》一文，梳理了学界研究成果和有关分析。文章刊发后，不少文化研究者打来电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对这首诗的深入探讨，有一定启示意义。

对于“红叶萧萧两岸秋”中的“红叶”，沧县文化研究者白世国认为，似乎可解释为柿子树叶或椿树叶，因为这两种树的叶子经秋之后都是红的。而运河边不乏柿子树，如今沧县大白杨桥一代就有成片椿树林，东光铁佛寺也有椿树。运河两岸有很多盐碱地，成片种植应有可能。文化研究者王立成认为，《“一船明月”驶向谁边》所提出的蓼花，应更为贴切，蓼花野生于水边，最为常见。以当代的情况来推测古代运河的情景似不妥。本文作者认为，运河堤上种柳，是官方要求，柳树耐水，可固堤系舟或砍倒防洪，柿子树或椿树不具柳树这种属性，当时以粮为主的北方，成片土地种植椿树或柿子树在经济上似不合算。且运河水以六七分行船为宜，船低堤高，又是垂暮，船上人视野未必能及于太远。

市区白家口居民魏洪忠说，郊外的大运河，因堤坝受到冲刷，有的地方会很低缓，行船于低矮平缓处，视野会比较开阔。“红叶”，或许只是一种意向，并没有特指。如非要解释，释为芦苇，也未必不可。考虑到文学意义，秋后落山的太阳很红，余光照到枯黄的芦苇上，给诗人可能会带来红的感觉。

对于“夜半不知行远近”，海兴文史研究专家刘立鑫说，他在主编《历代沧州诗选粹》时，是严格按照乾隆八年《沧州志》原本选入的，不是笔误。对于《沧州志》，也不能严判那时的编纂者们引错了。因为孙谔刊刻诗集后，精益求精，对诗文进行再修改的可能性很大。刘立鑫说，自己年轻时在沧州上学，经常骑自行车回海兴，黑灯瞎火时，常有见到灯亮而有以为马上到家了的感觉。定神一看，其实路还很远。用“近远”描述行旅者此时的心情，更贴切有意味。同是《历代沧州诗选粹》编者的孟建华赞同刘立鑫的意见，认为当前情形尚不明朗，“近远”“远近”两说不妨并行。

# 千字“请愿书”和漕运总督手书“章程” 入驻大运河非遗展示中心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9月5日上午，本报曾报道的修建捷地减水坝的千字“请愿书”和乾隆时期漕运总督鄂宝手书大运河管理“章程”入驻大运河非遗展示中心，两件具有唯一性和文献性的珍贵资料，成为大运河非遗展示中心征集文物以来的重要收获。

在交接现场，记者看到，鄂宝手书的大运河管理“章程”系用精楷写成，精裱成轴式长卷，有六七米长，天头留出大面积的题写位置。“章程”规定了整个大运河段的管理规定、开闸闭闸时间、河道河段等详尽内容，整个沧州段大运河的情况，都记述在案，是目前所见乾隆时期管理大运河最为详尽的原始官方资料。“章程”保存完好，几乎没有残损，堪称国宝级文物。制作者鄂宝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1776年）——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任漕运总督，“章程”系当时漕运衙门管理大运河的具体规定。

大运河非遗展示中心负责征集文物的人员说，今年8月以来，征集到很多与大运河有关的文物，千字“请愿书”和“章程”，对于大运河文化而言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对促成两件文物征集的《沧州日报》有关人员和文化研究者孟建华等人表示感谢，也感谢曾精心保存这两件文物的原收藏者。孟建华说，此前曾见过乾隆过沧州时本地接驾的绘画长卷，是用绘图的方式对当时情形的写实性原始记录，极为宝贵，可惜后来画卷不知去向。对于有关沧州大运河的文物征集，以后当不遗余力，为建好大运河上的博物馆作贡献。